「社會運動中的人類學介入：香港佔中」專號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1-4・2015
DOI:10.6152/jaa.2015.12.0001

導　言

衝突對話與新興想像的必要：兼論險境民族誌研究的可能

趙 彥 寧*

對話佔中：黨國、歷史、現場

2014 年 10 月中，佔中事件高峰期間，中國出生的牛津大學人類系教授項飆應香港中大之邀赴彼演講，認為抗爭中必可產生對話與理解，並鼓勵人類系學生進行「運動中的田野觀察」，在地生與內地生皆大受鼓舞。之後，項飆撰寫〈直面香港〉初稿，原訂在北京某刊物發表，以藉此與多數誤解佔中始末和意義的中國讀者溝通，然受制言論審查，刪除大半、且不得提及六四等當代中國關鍵群眾運動之後，方得以「潔本」刊出。經與項飆討論，我們期待該文可獲刊台灣學術期刊，以作為兩岸三地有關群眾運動、民主、黨－國等議題之辯論、交流、以及互相理解的踏板，並藉此反思和想像人類學積極介入大型群眾運動及社會爭議之限制與可能性。獲《考古人類學刊》林主編鼓勵，我再邀得黃舒楣與伊恩、葉蔭聰、陳浩乾四位以不同主體位置（都市空間研究者與地理學家、在地社運與文化研究學者、出身「模範黨員」家庭的在台陸生）積極介入佔中的作者，根據其長期參與觀察之心得，以對〈直〉文提出批評、以及延伸性的想法，最後再由項飆做出統合性的回應。

由於原先設定的對話對象為訊息受控的中國（大陸）讀者，項文（〈直〉）參照對比的關鍵歷史脈絡為八九學運後的中國反／民主發展，故而認為香港「雨傘運動」不僅體現了「民主」香港和「專制」大陸之間的緊張，更反應了中國整體「黨－國家」體制的內部矛盾。該文首先分析專業人士發起的反對特首選舉方案（即「佔中（環）」），如何演變成全港表達普遍不滿的「佔（金）鐘」行動；而各媒體對此二者的混淆，可能空洞化了民主實踐。之後分析香港的「民主」與「自主」如何在特殊的歷史和地緣政治下形

*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又與現實存在有何矛盾衝突。結論處則指出，「一國兩制」並非民主的產物，而是源自當時中共強大的政治領導能力；而目前的危機並非民主不夠，而在於中共角色的變化。香港的獨特並非其與大陸太不相同，而是尖銳地顯示了中國政治的深層矛盾。

自始至終在金鐘進行參與觀察的兩位地理學者黃舒楣與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引述 Victor Turner 的「閾限性」（liminality）概念，認為雨傘「現場」形同一大型的社會戲劇（social drama）場域，將香港轉化為一「非常城市」，並開啟了常態化都市生活的「缺口」：故而，前所未有的殷勤待客（hospitality）與「香港人已不同」基調，並非企求認同之「同一性」、亦不是民族／國族主義的老套，而是開啟了「香港人可如何不同」之可能性。在該劇場中，內地客與本地人交逢、本地人也親身接觸了過去隱而不彰的異質異族（比如華裔、南亞裔、荷裔）內在，並體會了「相遇交往中的奇異性」。該文並批評項飈過度強調八九學運的參照意義，因此忽視了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脈絡，起點並非始於金鐘，而是近年來各領域公民政治參與、抵抗的開花呈現；並認為與其說香港以其獨特方式指出中國整體的內在矛盾，不如說，她揭露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包括所謂民主體制的美國）內在的矛盾。

長期關注參與民主運動的香港文化研究學者葉蔭聰（〈直面黨國權力〉），以較為嚴厲的批判態度，認為項飈的香港論述源於缺乏在地知識，其當代中國敘事與汪暉等學者代表的新左派無異，二者皆過度輕易地沿用西方殖民論，故而迴避了黨－國權力在歷史進程以及政經運作的變化，也無視 1980 年代後中國共產黨在香港民主化過程裡扮演的關鍵角色，而此類黨領導權的神話，恰好就是中港兩地知性對話的關鍵阻礙。葉文的結論也是本專號中最為悲觀者，他認為中共處理雨傘運動的方式及其效果（尤以內地輿論而言）彰顯了其晚近的自信，故有結語「如何讓中港兩地民間力量可以限制黨國政經權力，在體制內及外開展哪怕是一小步的中國民主改革議程，才是希望之所在。關乎現今中國政局，這個希望還是很渺茫」。

社會學研究生陳浩乾（〈「群眾」和「黨」〉），質疑「項飈似乎未將群眾運動視為一個有望改造、影響當下中國的選項，而是表現出矛盾的態度，一方面希冀於群眾運動提出『挑戰』，另一方面又擔心未加深化的、以政治行動為目的的群眾運動會掩蓋『真問題』，並可能在歷史的錯綜關係中導向原本不預期的結果」，並由在台數年不斷重新建構的陸生主體位置，以批判性地反思「黨」的效用、作為與必要性，並因此反思民族／國族主義的暴力性效果。該文情感豐沛地說明，源自對於台灣主體認同以及陸生與陸配權利次等化的跨界體驗，他一方面感同身受「從台灣的視角出發，其對中國的焦慮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恐懼都非常真實」，同時在另一方面，上述情感結構也真實地生產了在台大陸人士的代罪羔羊處境。這個體會衝擊了他對於中國黨－國國族主義的反思，因此主張應交互主體地了解國族主義的形製過程可以如何造就個人的暴力性。

項飚在回應文（〈我們如何敘述當下、進入歷史〉）裡，藉由反思本身成長與知識主體位置的建構過程，提出了延伸性的看法。面對中國轉變中的黨國治理模式（即對社會的代表性消解、但是行政治理能力不斷提昇），更加凸顯「政治化」與「歷史化」的人類學視角實為重要。而晚近國際學界流行的「文明素質說」、「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等等分析中國的知識工具，則扁平化了充滿衝突性的社會生活，也反應了人類學本身的內卷化和封閉化。《社會運動中的人類學介入》小專號乃是在體認到必須參與歷史現場的急迫感、以及積極傾聽彼此同時逼問對方的集體嘗試。

險境民族誌的可能

我認為，本專號的嘗試性合作具有以下的激進意義。首先，正因為原定的讀者由中國大陸／內地轉為台港讀者，項飚首文對於中國共產黨黨史和社會政治脈絡的耙梳，和對中國黨－國運作、民族主義、新興資本權貴之間的連結的分析，有助于糾正台港讀者對中國理解的簡單化，把握中國政治內部的多重矛盾。

其次，源於各自生命經驗與情感結構的差異性，我們一開始即期待這是一場必然引發衝突的多方對話。重點是，我們知道對話不必然（也往往不會）形成毫無扞格的共識，甚至，對於「共識」（或「同一性」）的要求和期待，本身很可能即為霸權。也誠如黃舒楣、伊恩指出的，跨境／跨世代的對話，可以照見彼此執著的時空片段，而透過這個尚未形成具體意義的光暈，我們自己與讀者們或許可以進一步思索各個時空片段是否可以、以及如何想像差異對比的交互主體可能；而這種可能，或許也就回應了項飚第二文的結語「如何提煉、並不斷豐富『群眾』這樣動態的、能夠捕捉到實踐脈搏和潛力，同時又能夠引起和其他重要社會思想對話的範疇，可能是人類學者進入歷史的重要途徑也是任務」。在這個過程裡，警醒的對話參與者必會感覺到本身的侷限，因此感覺尷尬、窘迫、心虛、準備隨時粉碎著自己。如此的知識建構論，是源於「全貌觀」（holistic view）人類學界極少提出的，而本專號的作者們做出了初步的嘗試。

最後，一年前我們感受事件的急迫緊張，且分別受到擔憂、希望、憤怒、痛苦之情感激發，寫作的當下也反應了個人對於如何介入民主運動（以及特別是如何應對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的不同理解、期待、或想像。事隔一年，黨－國依舊悍然存在，或且更加自負強大（此點似乎應證了葉蔭聰文的結語）。雨傘主體是否安在？社會改革還可以如何進行？公民權利與國家主權之間有否其他形式的閾限空間？在貌似倖存的狀態下，差異衝突的合作嘗試與人類學的想像能力會否多向勃發？對於晚近已開始著手相關議題的人類學者而言，比如 Greenhouse 等（2002），香港（或許也包括台灣）正是吾人介入險境民族誌研究的積極起點。

引用書目

Greenhouse, Carol J., Elizabeth Mertz, and Kay B. Warren, eds.

2002 Ethnography in Unstable Places: Everyday Lives in Contexts of Dramatic Political Chang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